

國博服飾通史展首秀

融學者數十年研究成果

中國素有「衣冠王國」之美譽，數千年來中華服飾文化的發展歷程不僅折射出古代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發展軌跡，也勾勒出中華民族延綿不斷的生活畫卷。那麼古人的華服美飾到底有多精美？正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中國古代服飾文化展」揭曉答案。

展覽是國博首個服飾通史類展覽，以孫機等國博學者數十年學術研究成果為依託，按歷史時期分為六個部分，展出文物近130件(套)，類型涵蓋玉石器、骨器、陶器、服裝、金銀配飾和書畫作品等。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現場設有服飾互動體驗區。

江鑫嫻 攝

●展覽現場

江鑫嫻 攝



●康熙御用石青實地紗片金邊單朝衣。 國博供圖

●現場有元宋官員貴族服飾展示。 江鑫嫻 攝



●孝親曹國長公主像 國博供圖



●隴西恭獻王李貞像 國博供圖

系統回顧中國古代服飾演變史

展覽分為「先秦服飾」「秦漢魏晉南北朝服飾」「隋唐五代服飾」「宋遼金西夏元服飾」「明代服飾」「清代服飾」六個部分，全面系統地回顧了中國各歷史時期的主要服飾形制及其背後所包含的服飾文化，生動闡釋了中國古代服飾史上發生的三次重大變革：戰國時期「胡服騎射」引進中原，出現了上下身連屬的深衣；從南北朝到唐代，服飾由漢魏時的單一系統，變成華夏、鮮卑兩個來源之複合系統，由單軌制變為雙軌制；到清代，男子改着滿族服飾，華夏傳統服制斷檔。

展品中有數十件國博館藏一級品，包含極少展出的宋《中興四將圖》，明益莊王妃首飾、定陵出土首飾，清《皇朝禮器圖》、康熙帝朝服等。其中5件明代岐陽王世家文物（《隴西恭獻王李貞像》《孝親曹國長公主像》《贈南京錦

衣衛指揮使李佑像》《太保襲臨淮侯李言恭像》和《臨淮侯夫人史氏像》）在古代服飾史研究領域具有較高知名度，均為首次展出。

「古代服裝的變化，跟外界的環境和人的生產生活密切相關。服裝是一個人、一個民族社會地位、文化修養的體現，包含着審美。中國的服裝歷史超過五千年，甚至舊石器時代就有骨針穿獸皮，那時候就有原始的衣服了。」中國國家博物館終身研究館員、今次展覽策展人孫機認為，從研究角度而言，中國服飾史不僅漫長而且豐富。古代人的服飾，不僅能反映一個時代的經濟、文化和思想，也傳遞出不同時代的審美趣味和流行風尚。

孫機還提到，影視劇等文藝作品中常常會出現古代人物，在塑造人物形象時，服飾是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有些電視劇裏，不同人物的服裝相差上千年，比如張三穿的是先秦的衣服，

李四穿的是明代的衣服，給觀眾的感覺非常混亂。但我們不能要求這些影視劇的創作者去研究服裝史，這是很複雜的。我們希望通過博物館的展覽，把古代服飾的基本輪廓展示給大家，也能對這些創作者起到一些幫助。」他說。

15尊復原人像

除了大量直接表現古代服飾形制的實物，展覽還繪製了大量線圖、製作了15尊不同時代的服飾復原人像，力求完整呈現中國古代衣冠配飾的整體形象，充分展示中國古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燦爛成就，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立體版的中國古代服飾簡史。其中，2尊漢代、4尊唐代、2尊宋代、2尊元代、2尊明代、3尊清代共15尊復原人像無疑是整個展覽的最大亮點。

古代服飾史、傳統工藝美術學者陳詩宇負責復原人像部分。對於他的團隊而言，這並非易事。他們根據孫機提供的形象依據，考據出一個個詳盡方案，在手繪的時裝設計稿中，將每一套服裝都細細地拆解出來。每個人像，從妝髮、造型到服裝、鞋履、腰帶、配飾，甚至內衣，使用了什麼樣的面料和紋樣，都要一一考證，文物、繪畫、文獻就是團隊的素材來源。比如，西漢曲裾袍參照了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文物，清代行服和旗裝參照了故宮收藏的清代文物，《簪花仕女圖》則提供了不

少唐宋五代着裝的靈感。

「不同時期服飾的面料是不一樣的。」陳詩宇介紹，難度最大的是工藝和面料的復原和選擇。秦漢時期的主材料為羅、絹、紗，到了明代，增加了緞類，唐宋時期流行的是綾、綺。每種面料上應該使用什麼樣的紋樣也要經過精心的考證。此外，人像佩戴的玉珮、頭上插的金銀首飾等也涉及各種各樣的工藝門類。

科技融合 觀眾穿越

展廳內還特設互動體驗區，將古代服飾文化與現代科技有機結合，帶給觀眾有趣的體驗。一個柱坊結構的閉合式沉浸空間裏，以萬花筒形式展現了古代服飾中提取的花紋圖案，讓觀眾沉浸於流光溢彩的「華紋錦繡」中。在展廳的「霓裳舊影」互動區裏，觀眾只要在智能電子屏前揮揮手，就能輕鬆換衣，圓一把穿越夢。穿越到儀仗時代後，觀眾還可以將此定格，掃描二維碼把古裝圖片保存到手機上。

另外，展覽特別打造了一款能切換「補子」的常服顯示器，獅子補、虎補、豹補……各種等級的「補子」一目了然。據介紹，「補子」是一塊縫在官員服裝上的繡布，古代官員穿的官服也叫「補服」。自明代開始，「補子」作為官服上的等級標誌，沿用了幾百年。據悉，展覽展期擬定為一年。

萬象靈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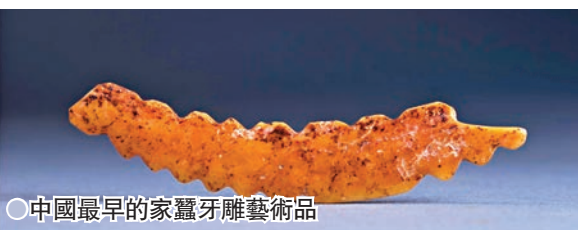
豫雙槐樹遺址入選「2020年中國考古新發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雷 河南報道）日前，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入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舉辦的「2020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名單。雙槐樹遺址考古發掘項目成為鄭州市級首個被納入國家重大社科基金的人文項目，被科技部作為全國11個具體項目之一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將繼續為探討中華文明起源等研究提供更多考古材料。

雙槐樹遺址位於黃河南岸以南2公里、伊洛河東4公里雙槐樹村南，河洛文化中心區域，專家建議雙槐樹遺址命名為「河洛古國」。雙槐樹遺址呈現出的景象與內涵，正契合《易經》「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的記載。2020年5月，雙槐樹遺址考古重大發現就成為考古學界舉世矚目的一顆新星，被業內專家學者稱為「早期中華文明的胚胎」、探尋黃河流域文明起源過程的一把關鍵鑰匙。



●鞏義雙槐樹遺址現場



●中國最早的家蠶牙雕藝術品

遺址處於距今5,300年前後的仰韶文化中晚期，現存面積117萬平方米，是迄今為止在黃河流域中華文明形成初期發現的規格最高、具有都邑性質的中心聚落。在發掘現場，分布於河洛古國居住區外側的三重大型環壕最深處9米，長度可達1,500米，形成了嚴密的防禦體系。三重環壕的工程量龐大，考古人員推斷這極有可能由周邊部落幫助完成，因此雙槐樹遺址或是當時的中心部落。

考古發掘表明，遺址周邊圍繞的鄭洛地區，和黃河兩岸星羅棋布的同期數百處仰韶遺存及城址，拱衛着都邑雙槐樹，顯示出雙槐樹是這一時期華

夏集團的政治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學會會長孫英民認為，這個時期正處在歷史傳說中的「黃帝時代」，可以說雙槐樹河洛古國正是華夏正脈。

《呂氏春秋》中記載：「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立宮」，這種追求中心定位的建都原則，也與雙槐樹遺址的考古發掘結果相應。

在內環壕內側、外壕與中壕之間，考古人員發現了呈排狀分布的大型墓葬區，體現出極強的規劃意識。在目前黃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這批墓葬是已被發現的規模最大、布局結構最為完整、最具規劃性的墓葬區。

遺址還出土了國寶級文物，中國最早的家蠶牙雕藝術品。它的發現成為5,300年前與桑蠶紡織業有關的確切證明，也為尋找絲綢之路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證據。貴族居住的中心居址區還有由九隻陶罐組成的北斗九星天文遺蹟。專家據研究認為，雙槐樹遺址連同青台的「北斗九星」遺蹟、天壇圓丘及有關建築，既是科學的天文遺蹟，也明顯具有特殊的人文含義。

著名學者、北京大學教授、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伯謙表示，北斗九星以及諸多凸顯禮制和文明的現象，被後世夏商周等王朝文明所承襲和發揚，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主根脈有望追溯至此。



恒雅藏珍

作者：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會主席 李秀恒

滿載歷史與工藝價值的印璽

備受關注的香港蘇富比「中國藝術珍品」專場於4月22日如期開拍，三件重要明清御璽難得聚首。經過激烈競投，其中明洪熙永樂仁孝文皇后青玉龍鈕璽寶以4,343萬港元成交，而清乾隆帝御寶交龍鈕白玉「紀念堂」璽則斬獲1.46億港元，同時刷新了白玉及御製玉璽兩項世界拍賣紀錄。

這枚乾隆印璽文刻「紀念堂」三字，根據璽體四周陰刻的乾隆御製詩文《紀念堂記》，可推知此印製作於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正值清代財力雄厚之時，因此宮廷工藝品用料不惜工本、製作精良。筆者幸在本次拍賣前上手細賞，玉璽上雕刻的龍從鱗片、龍鬚、足部皆精細至極，四周詩文以清秀的螭頭小楷書刻，可見工藝水平之高。2004年此印曾以逾1,400萬港元成交，17年後再現拍場，身價暴漲10倍。

除了工藝價值之外，更值得一提的是，這件御璽的歷史價值。乾隆幼時初見祖父康熙帝，是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三月於圓明園的牡丹台。康熙對乾隆疼愛有加，為他親授武術先生、親授詩書、親自培育，祖孫二人在熱河避暑山莊時更是「形影不離」，感情深厚。

因此，為銘祖父眷顧疼愛之恩，乾隆特將與祖父初見之地及避暑山莊內與祖父生活之地更名為「紀念堂」，並為兩處紀念堂分別製作了精美的印璽。本次拍品為圓明園紀念堂特製，另一枚避暑山莊印璽，現則藏於北京故宮。而1860年，置於圓明園的這方玉璽受到大火波及，留下了灼燒的痕跡，至今仍得以完好保存實屬難能可貴。

「璽」為皇帝印章專屬名稱，代表皇帝至高無上地位，是皇權的象徵。傳世御璽寥若星辰，近年來皇帝璽印的拍賣價格一路飆升。本次蘇富比的這方印璽特別之處，在於這方小小的印璽（10.4 x 10.4 x 7.8 cm），既體現了康乾盛世的國力及製作工藝，又蘊含了康熙及乾隆兩位皇帝的祖孫情誼，更承載了大清朝代覆滅的歷史結局，意義之重大多少有能出其右者。



●作者鑑賞印璽。



●清乾隆帝御寶交龍鈕白玉「紀念堂」璽（圖片來源：香港蘇富比）